

# 论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 ——以其对“三代之治”的评价为中心

刘茗钰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6)

**摘要:** 王阳明以“万物一体之仁心”思想、“良知”说、“亲民”说为理论基础, 在深入分析明中期社会诸多现实问题后, 以“三代之治”的理想治境为蓝本构建了理想社会的治理模型, 认为应兼行“养民”和“教民”之政, 让百姓皆能致其良知, 恢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心, 使得百姓能安居乐业, 各安其职, 天下得以大治、社会趋于和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并未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 受其“知行合一”观的影响, 他在现实中践行了这些思想, 尤其在教育和政治上有着卓越的功绩, 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统一。

**关键词:** 三代之治、万物一体之仁心、致良知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三代之治”<sup>①</sup>是历代儒家学派极力推崇的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型, 即有仁心的圣贤君王施行仁政的理想社会。先秦时期礼崩乐坏, 社会秩序失常, 孔孟则通过对“三代之治”的赞扬与肯定表明了对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 如《论语·卫灵公》篇中写道:“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sup>②</sup>, 但这里并未明确说明三代之道所指。《孟子·离娄上》则直接说明了“三代之治”即为仁治模式,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sup>③</sup>直至宋明时期, 又一次掀起了复兴“三代之治”的热潮, 欧阳修、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对“三代之治”做过相关论述。如张载的《经学理窟》中有大量关于“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主张; 朱熹则是在治统与道统分离的社会背景下, 通过区分三代与汉唐认为三代“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 导致了汉唐“全体却只在利欲上”, 主张“回到三代”, 正君心以治天下。王阳明甚至还专就“三代之治”这一理想图景进行了描绘, 下文将围绕《答顾东桥书》篇中他对其“三代之治”的评价来梳理和简要分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

## 一、王阳明“三代之治”思想的内涵

“三代”是一个带有极强政治意蕴的名词, 对“三代”的界定历来文献记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但儒家大多都将“三代之治”作为理想社会目标, 其细微区别处在于他们所关注的方面不同, 言论出发点不同。有的是从“三代”的社会状态这一方面来构建理想社会的蓝图, 如孔孟是对“三代”礼治、德治的社会状态的向往; 而有的则是以“三代”的相关政策制度这一方面为中心构建自己的政治思想, 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所描述的“三代礼业, 民共由制, 或素或青, ……王者必授命而后王”, 可见他更多是通过“三代”礼法制度的研究来探索新的政治权利制衡模式。

与前人一样, 王阳明也将“三代之治”作为其政治理想追求, 但因为问题意识、理论基础的不同, 所以较之于前人, 他的“三代之治”又有其独特之处。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详细地论述了“三代之治”的理想图景, 这些论述也进一步表明了王阳明所构建的理想社

<sup>①</sup> 三代之治: “三代”指由禹、汤、文、武统治的夏、商、周三代。

<sup>②</sup> 阮元:《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第2518页。

<sup>③</sup> 阮元:《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第2718页。

会模式并非完全同于古人，而是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的。

王阳明确了他所赞扬的“三代之治”是包括了唐、虞、夏商周三代的，他说“尧、舜之为帝，禹、汤、文、武之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谓其能明是学也。”<sup>①</sup>他之所以热衷于“三代之治”并对其进行详细论述是有其特殊的问题意识的，他是基于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分析，希望构建理想的社会模型来指导现实的社会问题。他生处明朝中晚期，深刻地洞察到了现实社会的弊端，了解到了底层百姓的艰苦，皇亲国戚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大规模侵占土地，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再加之赋税日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现象。此外，他为官在任长达三十一年，深知官场黑暗，皇帝昏庸、宦官专权程度超过以往朝代，所以他凭借对“三代之治”的肯定与赞扬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也正因如此，他开始以“三代”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出发点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并希望通过借鉴可循的历史经验去探索理想社会的政治模式。

《答顾东桥书》中的《拔本塞源论》一篇开头就表明“拔本塞源之论”是为学、治世之要，然后通过对“三代之治”的社会盛况的描述来反思当时社会政治、学风等方面的问题。在王阳明的描述中，“三代之治”是完美的，他对“三代”盛景赞扬有加，而且认为“三代之治”非后世可及。在他看来，天下得治的原因并不在明堂、学校的建立，而在于君王以仁民之心行养民之政，即行仁政。尧舜就是施行仁政的典范，他们将心中的仁爱之心推扩到养民政策上，尧重“敬授人时”，舜重“齐七政”。“三代”之学是以明人伦为要的，后世学者应学习圣人生而知之的义理——万物一体之仁心，并非将学习作为追求礼乐名物的手段或工具。王阳明以“万物一体之仁心”为理论基础，将唐、虞、三代君王所推行的教化视为恢复仁心，克制己私，扫除蒙蔽的方法，他认为“三代”的教者和学者都以明人伦为目标，即教会世人五种人伦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三代之治”的盛况不仅仅是世人都能得到圣人之教，更重要的是教化后的结果——人们各安其分、各安其业所达到的良善、和谐状态。王阳明对功利私欲充塞于道、仁义之心沦丧、巧文博词、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的状况深表忧虑<sup>②</sup>，所以他认为学校的教育应以“成德”为目标，这样世人在完善自己德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自己专长，最终根据德性和才干来任职，使其德位相配，让其先前所习得并恢复的万物一体之仁心能够在世间扩充流行。他所向往追求的社会状态就是人人都怀有万物一体的仁心，能够各自尽自己的能力从事于社会事务。

在对“三代之治”的盛况描述完后，他直指社会现实问题，他认为“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sup>③</sup>世人开始疯狂追求名利，圣学之旨被遮蔽，圣人之学日渐远离，而功利的积习日益强盛，他试图告诫后世学者应以明人伦，成德作为为学的目标，不应被私心私欲所蒙蔽。所以不同于古人，他所构建的“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模型不仅仅要求圣贤君王施行仁政，而且包括了培养每个人的“良知”来平治天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觉民行道”的为政理念，这样一来，他在为政安民、建立事功方面表现出与当时士人截然相反的务实作风，在治理地方过程中敢于为民请愿、救济难民，并注重发展地方生产，赢得了后人的赞誉。

## 二、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上文对王阳明“三代之治”内涵的分析来看，他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实质就是圣贤君王施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达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sup>④</sup>的和谐状态。可见这与他的“良知说”“万物一体说”以及“亲民说”有密切的联系。

<sup>①</sup>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56页。

<sup>②</sup>任健：《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之内容、特质及其检视》，《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sup>③</sup>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译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sup>④</sup>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译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在《答聂文蔚》一篇中，他说道：“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弊，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sup>①</sup>可见他的良知说与其社会治理思想密不可分，他认为人人致其良知，实现内圣后，天下自然就能得以太平。再者，他继承了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与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创造性地将“良知”与“仁”相结合，提出“万物一体之仁”，而且相较于张、程二人，他的“万物一体观念还可以从政治社会中的理想人间秩序角度来理解”<sup>②</sup>。在《大学问》中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sup>③</sup>这就是所谓的“大人之学”之关键在于“万物一体之仁”，而“万物一体”，即只有恢复和发现自己的良知良能，具备大人之仁心，才能“与天地万物而为一”，才能视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因此，圣人之学就是要去私欲，求大同，明明德，恢复“天地万物一体”的本然状态。王阳明说“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sup>④</sup>他的心学就是要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来实行仁政，践行儒家仁心仁政之道，从而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治理模型。总而言之，他的“良知说”与他的“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结合其实可看作是他观察和思考理想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立足点。

但对于王阳明来说，仅有内圣是不够的，真正的儒者必将万物一体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推进到现实政治领域，也就是将万物一体的理想落实到明明德、亲民的政治实践中，使得万物一体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秩序里去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良好政治生活。<sup>⑤</sup>所以他的“亲民”思想也与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密不可分。

最能体现王阳明“亲民”思想的就是他对古本《大学》的诠释，他批判朱熹将古本《大学》中的“亲民”为“新民”。他在《传习录》中第一条就集中讨论了“亲民”与“新民”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大学》以下的行文，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都更贴合“亲”字的意思，而非“新”字意，于“新字无发明”。“亲民”中包含有“新民”的意思，若单单提“新民”，则“便觉偏了”，可见他认为应该恢复“亲民”之原貌。究其实质不难发现，朱熹“新民”与阳明“亲民”之辩体现着他们社会治理思想上的不同，对于朱熹而言，“新民”就是指圣贤（学者）推己及人到民的“新”、教化，在他的思想进路中，“民”是“新”的主体，同时“民”也在教化下“自新”。而于阳明而言，“民”便不再是“亲”的主体，“亲”的主体只能是“为政者”，所以他强调的主要是为政者对“民”的“亲”。简而言之，朱熹更为强调“教”，认为只有通过圣人的教化才能让民众觉悟更新；而阳明则是在看到明朝统治者的腐败和黑暗，认定当朝统治者不能担当起救治人心的任务，上行救治之路线走不通。所以王阳明觉得在“教”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教”和“养”来共同实现，因此，他在教育和政治上独到的见解。<sup>⑥</sup>王阳明所谓的“亲民”可以概括为三层含义：一是爱民保民（仁民爱物），二是顺应民心，三是安民富民（为政者首要的职责是保持社会稳定，使人民安居乐业）。<sup>⑦</sup>在他看来，“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其天地

<sup>①</sup>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译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sup>②</sup> 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sup>③</sup> 陈荣捷著，杨儒宾/吴有能/朱荣贵/万先法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52页。

<sup>④</sup>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重修山阴县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3—274页。

<sup>⑤</sup> 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sup>⑥</sup> 王中原：《从朱王“新”、“亲”之辩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4期。

<sup>⑦</sup> 吴光：《论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孔学堂》，2014年第1期。



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sup>①</sup>“明明德”、“亲民”都是为了体天地万物之仁，最终实现天下向善。

他认为用“万物一体”的仁心去教化天下，教导天下之人“克其私”、“去其蔽”，在社会上推广人伦秩序规范，能够使家国天下中的主要社会关系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下，从而恢复三代之治，安济天下之民。

### 三、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的实践

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受其“知行合一”观的影响，往往具有务实性。虽然他认识到“三代之治”已不可往复，但他仍以“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治理模式为蓝本，提出了复兴之方法。下文主要从他教育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实践来看他为实现“三代之治”理性社会模型所付出的努力。

在教育方面，鉴于他所总结的唐、虞、三代的教以明人伦为主，他认为学校的教育目标应该是让学者明人伦，学圣人所生而知之的万物一体之仁心，学者更应以“致良知”作为学习的追求，去体认和恢复心中本然的良心善性，以此发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德之功用。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在龙场建龙岗书院开始讲学，他“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sup>②</sup>，本着“开导人心”的教化目标去教化百姓，此后，讲学成为实现所有人“皆能自致其良知”的主要途径。为便于讲学，他大力建书院（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阳明书院等）、兴学校（南宁学校思、田学校等）、办讲会。除了“讲学”、“会讲”这种对于文人知识分子的直接传道，他还建立“社学”、订立“乡约”。以《南赣乡约》为例，乡约包括文告和规条两部分。在文告中，王阳明指出，“凡人”与“圣人”只有一线之隔，人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关键就在于自己能否“致良知”，发扬自己心中的善性，知行合一，并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他制定“乡约”作为外在规范和强制措施，劝人向善，心存善念，以善待人，从而形成乡间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貌。再如王阳明制定推行的十家牌法，目的是为了告谕百姓要对自己进行自我约束，隐恶扬善，达到“强制”人们修身立善、“致良知”的目的。这一系列政策表明阳明的社会治理理念是“教”“养”兼具的。

在政治方面，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凋敝的现状，王阳明为了恢复“三代之治”，认为需惩治贪腐以肃政风。在《陈言边务疏》中，他对吏治的腐败做了详细的分析：“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sup>③</sup>由此，他规劝皇上“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并呈上了八条解决方案：“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sup>④</sup>他从选拔任用储备人才、利用长处规避短处、精简机构节省开支、屯田富民解决补给、赏罚分明振肃军威、安抚悬赏提升士气、蓄养兵力挫敌锋芒、严防死守以逸待劳等八个方面，对整顿吏制、整肃军队及提升作战能力等提出了相应的措施。<sup>⑤</sup>他希望通过效法“三代之治”以达到社会的理想状态，主张施行仁政善政、惩治贪腐、整顿吏治、正纲严纪。他曾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体恤民众疾苦，施行仁政，特别是在遇到水旱灾荒时，更向朝廷建议宽免税粮，赈灾扶贫，以安抚人心。1516年，王阳明在平息南赣等地民变后深刻反思了该地区民风彪悍、民俗不治的原因，认为匪患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府苛税暴政所引起。因此，他采取了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乡村治理策略，在剿除匪患的同时，采取措施抚恤平民，对不明是非、误入匪窝

<sup>①</sup> 陈荣捷著，杨儒宾/吴有能/朱荣贵/万先法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52页。

<sup>②</sup>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年谱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36页。

<sup>③</sup>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5-286页。

<sup>④</sup>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5-286页。

<sup>⑤</sup> 任健：《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之内容、特质及其检视》，《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者或者被迫胁从者，阳明向其发放食盐大米农具等物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生产困难，使其安定下来。1520年，江西西康、建昌、抚州、宜黄等县又遭受特大水灾，王阳明发布《赈恤水灾牌》，命令各府县官员将官仓内储备粮食用船装运至遭受水灾的乡村，并亲自把粮食分发到灾民手上。他还要求地方官员要爱民如子，切实对乡民施以实惠。<sup>①</sup>在为官期间，他还改革地方税收制度，并向所属官吏发布《禁约榷商官吏》，对官吏进行保护商业的政治教育，严重打击私征商税，骗税银的贪暴行为，他命令各衙门将“积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骗税银肥己，务要从实查明”，并“密切差人访拿，解赴军门究治，毋得容情回护”。<sup>②</sup>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发展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缓和社会税收矛盾以及帮助农民减轻负担都是极为有益的。

王阳明所追求的“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由于受到当时恶化的政治社会生态的影响最终并未实现，由于地方吏制腐败已积重难返，因而治理效果收效甚微，所以可以看出，他提出复“三代之治”的根本目的在于唤醒君主，引导君主效仿三代施行仁政德治，但晚明之贤君明相凤毛麟角，因而其美好的社会治理愿景难免步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德治窘境。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以“良知”为治心治政、兴学化民的原则，希望建立“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秩序，既兼备了“内圣”心性的完满，又达成了“外王”事功的圆成，实现了“内圣”与“外王”、治心与治世、立德与立功的统一，对当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3] 任健：《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之内容、特质及其检视》，《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 [4]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译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5] 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6] 王中原：《从朱王“新”、“亲”之辩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4期。
- [7] 吴光：《论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孔学堂》，2014年第1期。
- [8] 陈荣捷著，杨儒宾/吴有能/朱荣贵/万先法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 On Wang Yangming's thought of social governance --focusing on its evaluation of the "Three-generation rule"

Liu Mingy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6)

**Abstract:** Wang Yangming based his theory on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as one of all things", the theory of "Conscience" and the theory of "Affinity with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ideal governing

<sup>①</sup> 王金洪、郭正林：《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sup>②</sup> 毕诚：《王阳明的政教思想》，《教育史研究》，2009年9月。

environment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 the governing model of the ideal society is constructed, which hold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Supporting the people” and “Teaching the people” should b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so that the people can develop their consciences and restore their benevolence,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 , so that the people can live and work in peace, the world can be great governance, social harmony. His thought of social governance did not sta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was influenced by his view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 He practiced these thoughts in reality,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he unification of “Making virtue” , “Making speech” and “Making meritorious service” has been realized.

**Keywords:** Three-generation rule;Benevolence as one of all things;To conscience

**作者简介:**刘茗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